

## 《文明的政治》译后记

陈力川

（一）、莫兰在《文明的政治》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然而，社会主义初期的这一理想在后来的实践中因遭到背叛或颠倒而破灭。为了不断消除人类关系的野蛮性，为了让社会主义和民主获得新的生命，文明的政治需要回归“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想。这三个概念有一种对立和互补的复杂关系。只要自由，不能保证平等和博爱。强加的平等不仅不能促进博爱，反而会破坏自由。作为连接自我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博爱的作用是调节自由和减少不平等，它不能通过法令实施，而属于公民义务的范畴。公民意识薄弱或消失的地方，博爱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尽管我们需要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价值等量齐观，但应当承认，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自由的问题可能更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受到各种压迫的时候；而在另一个阶段，平等和博爱的问题可能更突出。但就整体而言，“这是一个与人类冒险交织在一起的长时期的历史工程：一项改善从人际关系到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关系的艰巨任务。”当务之急是团结互助与履行责任。因此，莫兰引用波兰团结工会的口号说：“没有团结，就没有自由。”文明的政治要再现希望，人们是在孤独和恐惧中承受忧虑，还是在团结和希望中分担忧虑，既关系到人类目前的处境，也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幸福与希望是成正比的。

（二）、莫兰在本文中提出的“生命品质”的概念非常重要。在全球化经济的刺激下，世人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但是生活水平不能与生命品质划等号，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必然导致生命品质的提高，就像舒服不意味着幸福一样？诚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活得更舒适，但不见得活得更好。活得更好须重视生命的品质，它包括与信仰有关的精神生活，与创造有关的文化艺术生活，与感情有关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这些都是幸福的必要成分，不是简单的舒服可以带来的。因此，莫兰强调“生命的品质表现为存在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福祉。”我们处在一个追求量化的时代，主宰当今世界的是经济、技术和科学的逻辑：只有可量化的才是实在的和重要的，不可量化的或被忽视，或被排斥。然而我们知道，可量化的通常是外在的东西，如财富、产业、学历、职称、头衔、奖励，以及广而言之的各种名利；而内在的

东西通常是不可量化的，如爱情、痛苦、欢乐、热情、诗意、感动等等。外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拥有，也可以失去；内在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感知，也可以长存于记忆。人生活在可量化和不可量化之间，就像生活在散文和诗之间一样。爱因斯坦说过：“凡是可量化的，都是不重要的；凡是重要的，都是不可量化的。”片面追求可量化的物质生活，不适度的消费，自我中心主义都是心态不文明的表现（没有心态文明，就没有生态文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人的物质生活，但也可以导致人性和道德的堕落。这一点，无论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我们应当区别增长与发展的不同，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发展理应含有质量的概念。

（三）、在“回归与寻根”一节中，莫兰指出“我们应当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和人类的多样性。”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是独特的，他的独特性在于能产生多样性，一如宇宙的独特性在于它产生了多样性。我们需要培养思考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能力，反对清一色的统一性或唯我独尊的多样性。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文化趋同，特性消失，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失业加剧；另一方面，它加深了我们都是地球公民的意识：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祖国，她与我们自己的祖国互不排斥。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增强，极权政府和世界霸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区域合作的政治愿望越来越大，对多元文化越来越宽容，为此，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全球国家或全球政府。后者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能保证结果令人满意。一个全球政府引发的安全问题很可能多于它能够解决的安全问题。在世界治理领域，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走权力集中和政治协调一致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大优点是效率，最大缺点是一旦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秩序，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就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政治体制和治理方法的实验空间就会大大萎缩，几乎没有被承认的可能。历史证明，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强权对真理的垄断。另一种倾向是走多元化世界秩序的道路，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平竞争，这条道路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大规模错误，比一个庞大的世界治理体系更灵活，更容易在实践中学习和纠偏，更能因地制宜地找到适合本国和本文化的解决办法。因此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应当建立在不同模式和多样化体系的和平竞争之上，而不是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权威，通过官僚组织和武装力量将它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于人。总之，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要比一个全球政府更好。

（四）、在“回归与寻根”一节中，莫兰还指出一个民族恢复自信心的两条道路，一是封闭的民族主义，一是开放的爱国主义。他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是法国忠实于自身的历史，回归普适人权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且将这一普适原则变成欧洲自我肯定的愿望和国际联合的样板。莫兰提倡的“开放的爱国主义”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知道，莫兰一向主张西方也要向东方开放，就像亚洲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一样，西方也应当向东方学习，特别是向佛教和印度教学习，尤其是它们在精神—灵魂—肉体关系上的思考和实践。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忽略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欧洲回归古希腊的源头，开创了新的文明。现在，西方也应当汲取世界多样化的文化源泉，创造新的文明。为此，应当结合各种文明优秀的成分，提倡文明的共生和互利。